

第一部分 区域经济

江苏吴江市盛泽镇的集聚经济

钟永一等^{*}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如何通过非农化和城市化完成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世所瞩目。这个问题很大，本文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及其形成的集聚经济角度，提供一个实证的个案研究——江苏苏州吴江市盛泽镇的集聚经济，目的是想说明，中国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家和农民是怎样加快企业、产业和城镇三个层次的集聚，努力解决乡镇企业“小而全”、“小而散”（布局分散）和“小而低”（技术和管理水平低）这个历史难题，推进二元经济转化的。

^{*} 钟永一：本课题组负责人和执笔者，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课题组成员有王峻岭：南京大学研究生；费共健：吴江市委研究室；钱允新：盛泽镇党委秘书。

一、研究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

(一) 现实起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阶段面对的历史难题

建国以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 1952 年到 1978 年，行政推动下城乡双向对流的“非正规转移阶段”^①；二是从 1978 年到 80 年代末“离土不离乡”以农村社区内非农化转移为主的阶段；三是从 80 年代末开始，进入“离土又离乡”、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相结合、非农化和城镇化相统一的阶段^②。

进入第三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历史难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转移量大，需要很多发展机会和很大的发展空间；二是第二阶段转移形成了“小而全”、“小而低”的乡镇工业企业大分散的布局^③。占用大量耕地^④造成工业污染广为扩散、企业难以形成专业化协作和规模经济。这种状况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⑤，但来自历史还得走出历史。“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历史难题，还得靠各级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家和农民去“解”。

^① 一方面是农民“招工进城”（仅 1958、1959 年“大跃进”就有 2500 万人）；另一方面是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城市职工居民下放（仅 60 年代后半期知青上山下乡就达 1700 万人），和招工进城农民清退回乡（仅 1961—1963 年就达 2000 万人）。城乡对流相抵，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净转移在 3500 万人左右，平均转移速度为 0.05%。参见国家统计局：《1994 年中国统计年鉴》，陈汉圣、吕涛“农村劳动力转移新阶段特点、问题和对策”，《农村经济研究参考》1994 年第 5 期。

^② 1979—1993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共转移 1.1 亿人（其中第二次产业占 49.6%，第三次产业占 50.4%）目前尚有剩余劳动力 1.2 亿人，到本世纪末预计将达 2 亿人。见陈俊生：《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基本对策问题》，《经济日报》1995 年 1 月 28 日。

^③ 据 1990 年调查，全国乡镇和村办工业企业，15%办在集镇，85%分布在村落。见张瑞：《关于创办乡镇企业开发区的探讨与思路》，《农业现代化研究》1990 年第 6 期。

^④ 据测算，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比城镇集中布局多占用 8 倍土地。见前引陈汉圣、吕涛文。

^⑤ 直到 1984 年初，中央政府才认可了乡镇企业的“合法性”。在之前，“不合法”的乡镇企业或为了得到社区政府的“保护”，宁可分散在农村；或因户口、粮油供应和就业政策的限制，只能分散在农村；或因资金、人才紧缺，不得不因陋就简、就地土法上马等。

实际上，对江苏、广东、浙江这类乡镇企业发展的先行地区和发达地区来说，能否解开这个历史难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二元经济转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了江苏省苏南地区的盛泽镇。

（二）研究对象：盛泽镇吸引人的方方面面

盛泽镇是个建制镇^①，下辖 36 个行政村，面积 66km²，在册人口 7.2 万人，加上外来劳动力在该镇就业的 3 万多人，常住人口近 11 万人。另外，平均每天有 1 万流动人口。1991 年盛泽社会总产值居全国各镇之首，被誉为“华夏第一镇”^②。

盛泽的地处江苏东南角，与浙江的嘉兴市接壤，距上海市区 99km，京杭大运河在境内贯通，苏（苏州）嘉（嘉兴）公路穿镇而过。以盛泽镇为圆心、在 120km 为半径的圆圈内云集了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吴江、嘉兴、湖州等长江三角洲一批发达的大中城市。盛泽所处的太湖流域是著名的蚕丝产地，“湖丝”享誉中外。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绸都杭州、苏州、湖州和盛泽都在这个区域。传统的蚕桑原料产地、著名的丝绸工业“圈”、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区域经济环境，使盛泽镇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选择盛泽，既看重它渊源流长的历史，更看重它繁荣昌盛的现实。

1. 现在盛泽镇已成为中国主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中国最大的丝绸集散地。1994 年丝绸工业总产值达到 80 亿元，真丝绸出口量占全国 1/5。位于该镇的中国东方丝绸市场销售额突破 75 亿元，是全国最大的丝绸专业市场。一个建制镇是怎样集聚起如此巨大的经济总量的？是怎样形成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的工业区位的？是怎样使丝绸这个传统工业在开放型经济中保持增长

^①建制镇是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1989 年底盛泽镇乡合并称盛泽镇。1993 年吴江市撤乡建镇，全市下辖 23 个镇。

^②《人民日报》1992 年 5 月 14 日。

和竞争活力的？这些，不能不使人要一探究竟！

2. 盛泽建镇 330 多年仅形成了 2.7km^2 建成区面积。但从 1985—1994 年 10 年间却新增了 7.3km^2 的建成区面积，使一个 10km^2 建成面积、11 万常住人口的现代小城市矗然而立。在全镇 8 万劳动力中，本镇劳动力和镇转移来的劳动力形成 1 : 1 的高比例。这个高速成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转移机制是怎样形成的？非农化和城镇化是怎样结合的？这样一个模式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的启示？这些，真诱人要去弄明白！

3. 盛泽，不仅是工业重镇，而且是贸易大镇、文化名镇，重工、崇商和尚文的传统和优势三位一体，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相互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比翼齐飞，实在难能可贵。

这个研究对象给人的感觉是，既有历史的纵深度，又有现实的丰富性；既有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可展开的多视角，又有工业的传统优势和现代技术、贸易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素流动的不同形式等多层面。

（三）逻辑起点：二元经济论、集聚经济论、制度创新和三个假设

1. 二元经济论和对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前提的假设。经过补充和完善的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逻辑起点^①。第一，我们赞同拉尼斯—费景汉和乔根森的修正，把农业剩余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第二，赞同对刘易斯把劳动创造资本的观点绝对化的批评，认为劳动创造资本是通过边际替代得以实现的（即要保证农业剩余和非农化，社会必须帮助农村解决资本稀缺问题^②）。

①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年）一文论点的补充和完善。包括刘易斯本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和乔根森模型等的修正补充，也包括舒尔茨和托达罗的一些观点。

② 蔡重直：《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根据以上界定，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假设是：在农业剩余存在的条件下，如果非农产业的反哺^①和国家的投资不能遏止城乡之间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继续拉大，那么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加速向非农产业特别是城镇空间转移。这是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提和趋势的假定，也是我们研究盛泽集聚经济的前提。

2. 集聚经济原理和对二元空间结构变动趋势的假设。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论时就指出，虽然传统社会农村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缺乏，但“资本和新思想不是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②，这是个十分重要但却被人忽视了的论点。我们把它同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的区位和非区位论点相结合^③，同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集聚经济论点相结合，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空间结构变动的假设：

只要坚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不断消除人为的空间进入障碍和行业进入障碍；“小而全”规模不经济和“小而散”集聚不经济的乡镇企业，就会逐步趋向企业规模经济、产业区位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三个层次上的集聚，改变非区位的空间经济结构状况。这样，我们就把二元经济的转化同二元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化联系起来，以更好地解释盛泽的集聚经济。

3. 制度创新的形成扩散论和对空间集聚主体行为及转移机

①反哺，已成为中国官方的一种正式提法。国务委员陈俊生说，改革以来中国“工农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标志是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作为当地工业主体的乡镇工业，为以工补农、建农和农村各项公益事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见《经济日报》1995年1月。

②区位论中把农业、工业和市场集聚的经济地理空间叫做区位，反之叫非区位。中国青年学者蔡昉提出非农化与劳动力转移应为形成区位效应而努力（《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8页）。

③巴顿认为工业在地理上集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能享有十大类型的集聚经济效益（1976年）。胡佛提出空间集聚经济溯源于特定产业的规模经济（1975），艾萨德则认为决定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有企业的规模经济、产业的区位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等三种集聚力（1975年）。

制的假设。制度创新理论是我们的又一个逻辑起点。正如诺思等指出的，制度是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兴起的原因所在^①。中国近十几年来非农化的发展以乡镇企业组织制度创新为动力，并且使这个创新过程迅速传播和扩散。恰如赫曼森所说：“发展的过程，就是把一浪接一浪的创新在职能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引进和传播的过程”^②。这种创新形成和传播的动机是以直觉理性和有限理性为特征的中国城镇化行为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③。也就是说，作为行为主体的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镇企业和农民，只要不超出中央政府“不允许”或“禁止”的正式约束范围，就会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在非农化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个假设是：以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为特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非农化主体，只有在非农化和空间集聚过程中坚持制度创新并把创新成果一波接一波地在乡镇的职能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引进和传播，才能加速新兴城镇的发育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失。这是对农村劳动力空间集聚主体行为和转移机制的假设。

通过以上对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前提、二元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和转移集聚行为和机制的假设，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适合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集聚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

二、集聚模型的验证：盛泽经济的数量分析

（一）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产业区位经济分析中的运用

①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西方世界的兴起》序言，学苑出版社中译本 1988 年版。

②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 页。

③ 赫伯特·西蒙认为：“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1）适合实现指定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间”。有限理性即“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中译本）。从逻辑上说，目标最大化与完全理性是一致的，与有限理性和直觉理性是相悖的。我们采纳这样的解释：有限理性只是修正了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最大化行为本身（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版）。

境外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仍然是研究大多数中国产业的恰当的计量经济模型^①。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用柯—道函数同时反映盛泽企业和主体产业丝绸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以此验证企业的规模收益和产业的区位收益。

地区的集聚经济有三层含义：即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产业区位优势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盛泽经济的特点是以丝绸工业为主，而丝绸工业又在镇建成区范围内相对集中。因此，我们分析的重点是第二层次的集聚经济——产业区位优势经济。

柯一道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Y_t = Ae^{\lambda t} L_t^\alpha K_t^\beta \quad (1)$$

式中： α 和 β 分别代表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 λ 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率； A 代表经济效率指数。

要素间替代性 = 1。它的对数变换形式为：

$$\ln Y_t = \ln A + \lambda t + \alpha \ln L_t + \beta \ln K_t \quad (i=1, 2, \dots, n) \quad (2)$$

生产函数既可以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可以反映一个区域内整个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在企业层次上，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ln Y_{it} = \ln A + \lambda' t + \alpha' \ln L_{it} + \beta' \ln K_{it} \quad (3)$$

它含有这样的假定，一个区域内相同行业的企业具有相同的技术进步率，并有相等的劳动、资本产出弹性。在企业层次的生产函数中， $\lambda' = \alpha' + \beta'$ 为规模参数， λ' 表示剔除劳动力、资金、规模经济贡献后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其中既包含知识进展带来整个生产边界的移动，也包括其他因素如相同行为企业相对集中而带来的节约。方程（2）可以作为整个行业的总生产函数。其中，规模收益参数 $\lambda = \alpha + \beta$ 不仅反映企业内部的规模收益，还反映整个

^① 参见贾力群：《中国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一种数量分析》，《经济译文》1993年第2期。

产业区位经济^①。这是因为在行业层次上产业区位经济可视为一种内化的“规模收益”。因此，在此层次上的技术进步率 λ 也就是剔除了产业区位经济的贡献。综上所述，比较两种层次上的生产函数，其技术进步率之差：

$$\Delta\lambda = \lambda - \lambda' \quad (4)$$

可以看成是产业区位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样就把产业区位经济从广义技术进步中剥离出来了。

关于企业层次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我们注意到，在方程 (3) 中，所有企业都假定处于前沿生产函数边界上即对于一定量的投入 $\hat{X}$ ($\hat{X}$ 为投入向量)，相应产出 $\hat{Y} = F(\hat{X})$ 。而在实际生产中，企业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达不到生产边界，即对于 $\hat{X}$ ，实际的产出

$$\hat{Y} \leq Y = F(\hat{X}) \quad (5)$$

当 $\hat{Y} < F(\hat{X})$ 时，就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技术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其表现是投入过多。因此，

$$E_i = \hat{Y}/Y \quad (6)$$

被定义为技术应用效率，通常是 $E_i < 1$ 。各个企业的技术应用效率是不同的，如果假定 E_i 在时间上保持不变，即 E_i 仅与 i 有关，而与 t 无关，则方程 (3) 可以写成：

$$\ln Y_{it} = \ln A + \ln E_i + \lambda t + \alpha' \ln L_{it} + \beta' \ln K_{it} \quad (7)$$

上述参数中仅有 E_i 与 i 有关，因此，作如下变化，各企业每期的数据减去上期的数据，方程 (2) 就成为：

$$\begin{aligned} \ln Y_t - Y_{t-1} = & \lambda' + \alpha' (\ln L_t - \ln L_{t-1}) \\ & + \beta' (\ln K_t - \ln K_{t-1}) \end{aligned} \quad (8)$$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各个企业（截面数据）和各个时期（时间序列）的资料结合起来估计上面的参数，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样本

^① G. A. Carlino,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n metropolitan manufacturing. J. Reg. Sci., 19, 363-73 (1979)。

的自由度，并且有效地解决了 LnL 、 LnK 之间共线性问题。

我们抽取了对盛泽镇经济影响最大的 10 个企业：江苏新生集团公司（原吴江新生丝织总厂，国有企业）、吴江新联丝织厂（国有企业）、吴江新华丝织厂（国有企业）、吴江绸缎炼染一厂（国有企业）、吴江新生化纤厂（国有企业）、吴江新民丝织厂（城镇集体企业，又称市属大集体）、中国鹰翔集团公司（原盛泽印染总厂，镇办企业）、江苏艺龙集团公司（原吴江工艺织造厂，镇办企业）、苏州东方丝绸集团公司（原东方丝绸印染厂，镇办企业）、吴江目澜丝织集团公司（镇办企业）。截面数据和 1988—1994 年时间序列资料^①。这些企业，虽然样本数只占全部丝绸工业企业数 140 个的 0.7%，但它的经济总量却占全镇丝绸工业经济总量的 82.5%；其中，4 个乡镇企业总量占全镇乡镇工业总量的 75.4%（数据略，见附录）。这 10 个样本企业 5 年的数据可以大致反映集聚经济的变动趋势。

（二）企业层次和行业层次的估计结果

1. 企业层次柯—道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text{Ln}Y_t - Y_{t-1} = \lambda' + \Phi D + \alpha' (\text{Ln}L_t - \text{Ln}L_{t-1}) + \beta' (\text{Ln}K_t - \text{Ln}K_{t-1})$					
λ'	Φ	α'	β'	γ	F
0.208	0.35	0.42	0.10	0.52	8.03
(4.295)*	(4.46)*	(1.438)	(1.105)		

注：* 该系数在 0.99 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

2. 行业层次柯—道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① 根据美国标准行业分类（S. I. C）数码体系，这些企业的 SIC 数码前 3 位是相同的，我们把它们视为同一行业是合理的。在时间跨度上我们获得的是 1988—1994 年的资料，有关行业的数据采用 1986—1993 年的时间序列。

$$L_n Y_t = L_n A + \lambda t + \Phi D + \alpha L_n L_t + \beta L_n K_t$$

$L_n A$	λ	Φ	α	β	γ	F
8.29	0.149	0.54	0.52	0.11	0.63	115.2
15.822 *	(4.96) *	(3.70) **	(0.10)	(1.22)		

注：* 该系数在 0.99 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 * 该系数在 0.93 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

分析两个计算结果的主要参数，我们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1) 产出集聚作用明显，丝绸工业区位经济被肯定。产业区
位经济贡献：两生产函数技术进步率之差 $\Delta\lambda = \lambda' - \lambda = 5.9\%$ ； $\frac{\Delta\lambda}{\lambda}$
=28.3%，由产业区位经济直接导致每年技术进步率增加 5.9%。
从相对量来看，广义技术进步率中产业区位经济的贡献为
28.3%，即技术进步中有近 1/3 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的，产业区
位经济在盛泽镇的丝织行业中表现得很明显。

(2) 企业内部规模收益尚不明显，企业规模经济还有待提高。
企业内部规模收益 (γ)：没有迹象表明，企业内部规模参数 γ 大
于 1，表明盛泽企业中规模经济不明显，甚至可能存在规模不经
济。

三、盛泽模式的解说：空间集聚是怎样形成的

(一) 以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为核心、企业集团为主要形式，
实施微观经济层次的集聚

从 1984 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①，而苏南一
些地区却把注意力转向企业重组。1985 年，盛泽(镇乡合并前)关
停并转了 40 个企业中的 17 个 镇乡合并后又进一步作了调整，开

^① 1984 年 1 月和 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下达 1 号文件和 4 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纠正了前几年限制乡镇企业的错误做法，明确了扶持和发展的方针。1984 年全国乡镇企业数比 1983 年增加了 2.5 倍，1985 年又比 1984 年增加了 1 倍。参见《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8—1986）》、《中国乡镇企业统计摘要》(1991 年)。

始了企业层次上的集聚。

1. 以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为核心。企业合并重组只是微观层次集聚的一种形式，真正的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必须以生产设备为核心^①。丝织企业设备的规模经济是由织机的数量决定的，印染企业的规模经济则是由印染设备或生产线的生产能力决定的。盛泽提高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带动全面技术改造。1984—1991 年 7 年中，全镇共引进无梭织机 900 台（效率为当时国产织机的 10 倍），占引进企业织机总数的 60%，而当时全国丝织企业的比重仅为 3.2%。印染设备则引进了液流染色和精度布动园曲印花生产线 13 条。这就使盛泽的骨干企业具备了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

2. 发展企业集团，培植公司内的规模经济。盛泽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注意培植骨干企业，到 90 年代初企业集团公司形式受到特别重视，在乡镇企业中最引人注目的“五大集团”固定资产净值已达 13.2 亿元、工业总产值达 57 亿元，足以影响盛泽经济的大局。这一地位主要靠企业集团公司内部三个方面的规模经济支撑。以鹰翔集团为例，一是以 7500 万美元引进 104 台喷水织机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纺丝设备，形成了丝织和纺丝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二是公司内形成了纺、织、染、服装加工有专业化生产工厂，专业化生产和管理，节约生产成本而形成的规模经济；三是公司内各工厂企业共享研究开发、销售组织和财会管理等资源，避免了人才分散、机构重复设置，形成了低组织管理成本的优势。该公司董事长 80 年代末就说：“乡镇企业‘船小码头多、船小调头快’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该走船大抗风浪的规模经营之路”^②。

① 从外延看，规模经济包括：一生产设备的规模经济，二工厂的规模经济（设备规模经济加上专业化水平提高带来操作成本的节约），三公司或集团内的规模经济，（前两条规模经济加上各工厂共享研究开发、销售组织、财务会计而形成的节约）。参见杨宏儒：《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② 《苏州日报》 1992 年 7 月 1 日。

（二）产业传统、先进技术和行业竞争共同塑造了丝绸工业区位优势经济

1. 悠久的丝绸产业传统造就了特有的产业文化。区域是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地区^①，盛泽的同质性和内聚力是什么？丝绸。建镇 300 多年来，人们提到盛泽就想到丝绸，提到丝绸就想到盛泽。这样准确的“定位”，在中国几万个乡镇中十分罕见。从 15 世纪 80 年代手工丝绸业产生 500 年来，盛泽经济的兴衰荣辱都是同丝绸业联系在一起的。到了 80 年代中期，中国兴起发展耐用消费品热潮，但盛泽还是坚持发挥自己的区域产业优势——丝绸业。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盛泽人天生就有“丝绸细胞”。盛泽人自己则说，他们那里有一种特殊的“丝绸氛围”：一批有几十年历史的丝绸企业、几代生产经营丝绸的行家里手，一整套完整和成熟的纺织印染实践经验，一个耳濡目染的社会环境。“丝绸细胞”、“丝绸氛围”，从文化学角度，可以视为产业文化基因，它成为区域内聚力和同质性的深厚力量。

2. 依靠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产业集聚的优势。盛泽人要以瑞士手表业的发展经验为榜样，认为丝绸业优势的保持，不仅靠传统，更要靠先进技术的武装和改造。从 1992 年开始，该镇确立了“两个突破”的技术改造方略。一是在技术改造的投入数量上求突破，要求每年的技改投入不少于上年年末固定资产总额的 1/3；二是在技术改造的水平质量上求突破，每年引进先进设备占当年技改投入的 70% 以上。据我计算，他们确实做到了：技改投入 1992 年 3.5 亿元、1993 年 6 亿元、1994 年 5 亿元，1994 年固定资产原值就达到了 17.5 亿元；引进的是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设备。由于有这样的技术改造速度和力度，传统的“丝绸之乡”开始走向现代化的“丝绸之路”。

^①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6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03 页。

对传统丝绸工业的改造推动了丝绸工业区位的形成，其构成：一是 21 家国有企业及市属大集体企业（都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通过技术改造已成为苏州市丝绸工业的骨干企业；二是 13 家镇办企业（也都在镇建成区内）目前经济总量已超过前者；三是近百家村办企业。据估计，目前盛泽镇丝绸工业总量的 80% 已集聚在 10km² 的建成区内，一个新型的丝绸产业区位已经形成。

3. 效率筛选式的同行业竞争是专业化产业区位形成的主要推动力。盛泽镇几十家企业集中于丝绸行业，是如何保持产品开发、技术改造的活力和专业化方向的呢？靠效率筛选式的同行业竞争^①。

盛泽镇丝绸工业主要集中于丝织和印染（缫丝分布在附近的震泽、八都、平望等镇和吴县市、锡山市）分真丝绸和化纤丝绸两大类。它面临太湖和杭嘉湖丝绸工业圈内同行业的，特别是浙江数万台私营和个体织机的竞争压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江浙两省和苏州嘉兴两市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丝绸工业的行业结构和地区布局主要靠市场竞争调节。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目前形成的竞争格局为：国有企业和市属大集体企业在真丝绸的生产和经营中形成了竞争优势（一方面是历史悠久有技术、设备和人才优势；另方面还有国家长期对蚕茧实行统一收购和分配的体制原因）；镇办骨干企业在化纤丝绸的生产和经营上确立了竞争优势；村办企业则在中低挡产品特别是里子布的生产经营上具有成本和价格优势（成本只相当于外地的 1/3—1/2）。在真丝绸织造印染、化纤丝绸织造印染和中低挡丝织产品三个方面，盛泽已经形成了经济进入壁垒和行业内部分工，形

^① 乔治·J·施蒂格勒认为，“不同规模厂商的竞争会筛选出效率较高的企业。”“所谓有效率的厂商规模，其含义是在这一规模上，企业家能对付他在实际经营中碰到的所有问题：如紧张的劳工关系、日新月异创新、政府管理、不稳定的国内外市场等等。毫无疑问，从企业的观点看，这正是效率的决定含义。”（《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1987）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我们应用这个生存原理解释盛泽现象。

成了一种垄断竞争格局。

（三）依靠富有活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机制强化集聚经济的物质载体

1.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投入和资金来源。经济集聚是经济组织与基础设施在一定空间范围结合的过程。盛泽从 1986 年开始适应企业规模经济和产业区位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和力度。据我初步统计，从 1986—1995 年该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洪涝综合治理 1700 万元、交通 1600 万元、供电供水设施 6700 万元、污水处理 3200 万元、通讯设施 500 万元、市场建设 7000 万元、教育 500 万元、社会治安和法制建设 1800 万元。另外，各类企业在镇建成区内建设厂房、宿舍和商住楼等 100 万平方米，投资约 6 亿元。按这个不完全统计，盛泽近 9 年来对社会基础设施共投入约 9 亿元。

这些资金从何而来？不是靠省、市的“特殊优惠政策”，而是靠各类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来支撑。首先是按上级政府的规定取自各类企业的三项费用：第一，按农业部和财政部规定，税前按利润总额的 10% 提取，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第二，教育附加费按利润总额的 6% 收取（国有企业按 2%）。第三，建农基金每年按每个职工 120 元收取。这三项收费比例各乡镇都是一样的，但资金的多少取决于企业经济规模的大小。还有两项费用的收取比例是镇政府确定的。第四，镇办企业按销售收入的 5% 上缴管理费。第五，镇办企业的税后利润按一定比例上缴（目前约为 25%）作为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如果这五项费用都收足了，每年有 5500 万元左右，其余部分用集资办法解决。

80 年代中国非农化产业的集聚程度不高，小城镇的社会基础设施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落后状况又是由于乡镇资金短缺、投入不足造成的。这个判断适合中国目前一般的乡镇，但对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却缺乏解释力。这些地区，资金相对宽裕，城镇集聚进程和效果却差异很大。什么原因？从盛

泽经验看，还有乡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的差异！

2. 投资取向和机制。交通、通讯设施落后、能源供给短缺，是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共性问题。盛泽也着力去解决。盛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更多的解决影响镇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三大个性问题。第一，治水防洪。盛泽地势低洼，60%的面积低于上海吴淞标高 4m，1983—1987 年受灾 7 次，工厂停工、码头停运、学校停课。显然，洪涝问题不解决，盛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脆弱的。第二，供水治“污”。盛泽丝绸工业的漂、印、染工艺离不开水又污染水。能充分地供水并有效地处理污水是衡量盛泽工业社会效益的主要标志。第三，建大市场。东方丝绸市场建场 9 年销售额从 1.9 亿增加到 75 亿元，入场经营厂家由几十户发展到 4000 户。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大大增长，使盛泽经济有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1991 年，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天津、四川、湖北、山东地区发展项目组之约，提出应列入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和发展议事日程的三大策略指向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发展各地区经济基础的关键因素”^①，盛泽的发展路子，与这一建议不谋而合。

盛泽丝绸工业的高度专业化和集中化的行业结构引致了地区内部、地区之间和行业内部竞争的“叠加效应”，即盛泽不同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企业之间的竞争，盛泽与其他乡镇和城市的竞争，同时也就是丝绸行业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的要求迫切，而且重点的取向比较一致，形成巨大的竞争推动力。另外，就是富裕起来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的需求愈来愈高。

（四）创新集团的发动、引进和扩散功能

盛泽的集聚经济，是通过盛泽创新集团发动“创新波”不断

^①杨开忠：《迈向空间一体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推进和逐步实现的^①，或者说，创新的发动、引进和扩散是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行为主体的基本行为特征。

1. 四次大的“创新波”。人们注意到了苏南出现过 60 年代“造田”、70 年代“造厂”、80 年代“造镇”的“三波”现象。其实，根据盛泽的经验，更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四大“波”。第一，从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乡镇企业企业制度的“创新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中国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兴起，是集体经济的监管者（乡镇村干部）“冲破国家对加工工业高利润的独占”、“引入剩余权激励机制”寻求“有效的经济组织（产权）”的一项制度创新^②。第二，即前面提到的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变革乡镇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设备的“创新波”。第三，从 1986 年开始建立现代营销体系的“创新波”。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采取的是“四千四万”的营销模式（组织千军万马——供销员，涉千山万水，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搞供销）。这是一种方法原始、成本较高的交易方式。盛泽通过建立大型批发市场——东方丝绸市场，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第四，1986 年以后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城镇建设“波”。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国家财政对建制镇的城镇建设几乎没有专项拨款，主要靠镇本身发展经济积累和投入。盛泽依靠发展村集体经济解决了建制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体制和机制问题，这可以说，是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成果在城镇建设上的成功运用。

2. 创新集团的结构特征和行为特征。盛泽空间集聚的行为主体——盛泽创新集团，是由该地区的企业家集团（包括各种经济成份和形式的企业）和镇村党政领导群体组成的。从苏南集体经济模式的实践看，我们倾向于肯定党政领导群体在迄今为止制度

^①“创新波”是创新理论的开创者熊彼特的提法。我们把赫曼森关于发展过程也是创新的空间扩散过程论点组合进去，用以说明创新与空间集聚的关系。

^②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 年第 3 卷总第 8 期。

创新中的地位^①。在集体经济内部，他们受社区全体成员的“委托”是集体所有权的代理人或“集体监管者”；对于实行承包制的经理他们又是委托人。在这个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他们的创新观念及其正确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决策是依靠企业家群体的操作运行去实现的；他们的许多创新观念、重要决策和运作措施，又来自企业家的大胆探索和积极建议。

目前，在盛泽的乡镇企业家中已形成一个明显的递次结构。具有不同经历、经验、知识结构和年龄的企业家分别在企业集团公司、骨干企业和分（子）公司中任职，各扬其长、优势互补；经常流动，优“升”劣汰；年龄梯度明显，使人才源源不断。该镇在企业家的培养选拔使用上已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出”的鲜明行为特征。90年代初盛泽党委和政府提出：放开胆子，拓宽路子，内挖外引，培养提高，尽快建设一支规模较大、素质较高、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经济人才群。它推动了一个企业家集团的形成。

四、结语：盛泽模式的含义

1. 盛泽模式，从发展过程看，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空间转移和集聚为主要形式，高比例吸纳外地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它实质上是以企业规模经济、工业和市场区位经济为内容，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的城市化经济，通过人口、企业和各种资源的集中获得集聚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盛泽为中国非农化提供了一个城镇化模式。

2. 盛泽模式，从阶段目标看，为中国农村工业化中成长的新兴城市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参照系。按估计，到本世纪末盛泽将是具有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空间结构基本合理、城市功能初步

^①在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中，乡镇党委书记仍是地区决策集团的“第一把手”，而且相当多的书记兼乡镇农工商总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党支部书记兼，并且多在规模较大的村办企业中任职。